

# 敦煌文獻所反映的中國古代裝幀形制之演變

## ——以英藏敦煌文獻為中心

[英] 秦思源 (Colin Chinnery) 著 林世田譯

**提要：**本文作者在深入調查英藏敦煌文獻中的書籍裝幀材料基礎上，綜合國內外學者研究成果，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深入研究敦煌文獻中的書籍裝幀材料，將會豐富人們對中國書史的認識。

**關鍵詞：**中國書史 裝幀形制 敦煌文獻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亂迫使中國政府將駐扎在西域的軍隊撤回中原，吐蕃武裝趁虛而入，佔領了包括敦煌在內絲綢之路上的大部分城鎮，統治長達一個世紀。敦煌與中原的聯繫因而中斷，以前從中原地區輸入的商品，如精製紙張，再也無法得到。儘管 851 年忠於朝廷的當地軍隊收復敦煌，然而這時中央權力削弱，中原與西域的聯繫若即若離。從現存文獻的紙質和書跡來看，我們知道絕大多數冊葉書籍形態出現在晚唐五代時期。不同於其他文獻，絕大多數的冊葉書籍不是來自中原，而是在當地製作的。敦煌冊葉書籍一個最有趣的特徵是各種裝訂形式非常之不同，不但有蝴蝶裝和綫裝，而且還出現許多新的裝幀形制。在敦煌文獻中也存在三種不同的裝訂形式混合在一起的形式，即：綫裝與蝴蝶裝；蝴蝶裝與包背裝；綫裝與包背裝。

綫裝、蝴蝶裝以及包背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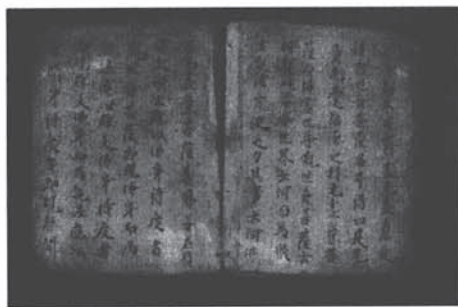


圖 1 蝴蝶裝 (Or. 8210/S. 5556)

每頁尺寸 (cm): 12 × 15

此書為蝴蝶裝形制，把書籍的頂端和底端打孔穿綫，為保護書籍封皮將兩層紙粘貼在一起。



圖 2 布皮書 (Or. 8210/S. 5535)

尺寸 (cm): 11 × 17.3

此蝴蝶裝書籍外皮粘貼一層紅布，英藏敦煌文獻中僅存一件。



圖3 經折裝改裝成蝴蝶裝  
(Or. 8210/P. 11)

尺寸 (cm): 10 × 14

此為經折裝和蝴蝶裝混合形式，也是所存不多的印本書籍。原為經折裝形式，把折邊粘在一起如同蝴蝶裝的折邊。如此稍加改造，經折裝的書籍便容易攜帶和翻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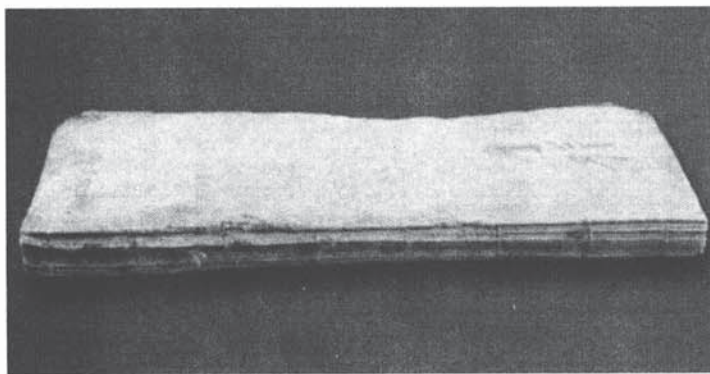


圖4 訂在一起的加長經折裝  
或梵夾裝形式

(Or. 8210/S. 5475)

尺寸 (cm): 10.5 × 27

此綫裝書尺寸如同經折裝或梵夾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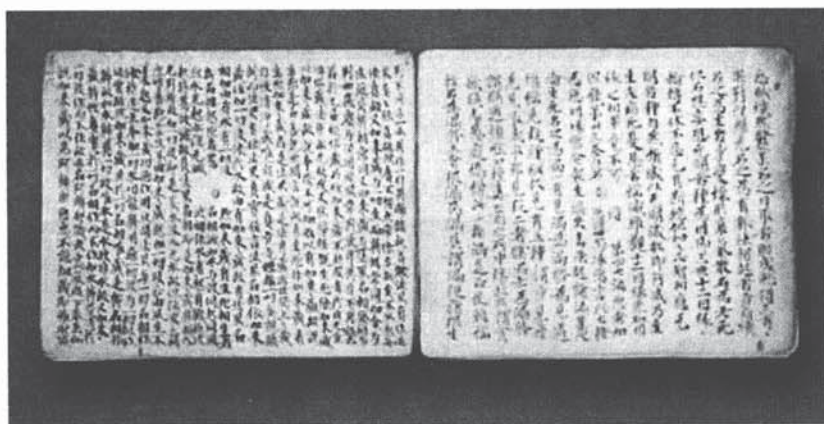


圖5 蝴蝶裝形式的梵夾裝 (Or. 8210/S. 5668)

尺寸 (cm): 16.7 × 13

儘管這本書為蝴蝶裝形制，但是並沒有粘在一起，而是採用梵夾裝的形式，中間打孔，用繩穿在一起。孔的邊緣沒有破損，似乎並未穿繩。

儘管許多不同的裝幀形制可以在這批文獻中找到，但是無法直接證明其與中原裝幀形制的發展聯繫在一起。此外，除非在某地區大範圍內流行某種特殊裝幀形制，否則我們只能假設這些不同的形態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的意願獨自創造的。敦煌文獻中有三本冊

葉書籍是由同一個人在 80 歲時抄寫並裝訂的，每一本的裝訂方式多少都有一些差別（見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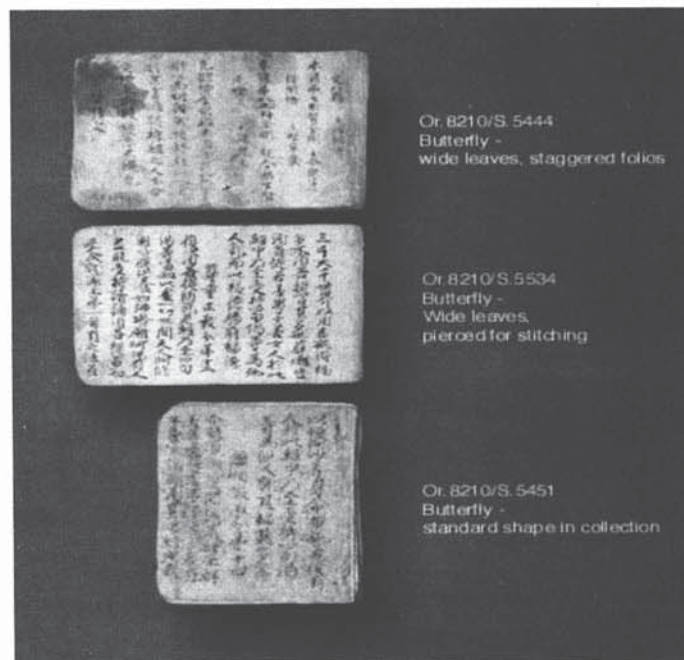


圖 6

古代紙張非常珍貴，人們採取各種措施盡可能延長書籍的壽命。而且，絕大多數書籍的製作特點是容易攜帶和翻檢（見圖 7），以預防以後因過度使用而損壞。書籍製作時還有一個因素要考慮，最初的折葉冊子，如蝴蝶裝冊子容易散落，人們自然會想辦法克服這一缺點。不管是綫裝還是包背裝都是這種不斷實踐的結果，也許是受外部影響的，現在尚無法考訂。然而，敦煌文獻中的一些例子足以說明書籍裝幀的發展，是在不斷探索、改進中前進的（見圖 8）。



圖 7 Or. 8210/S. 5433

此冊因為太長而折疊，折疊之後大小與其他本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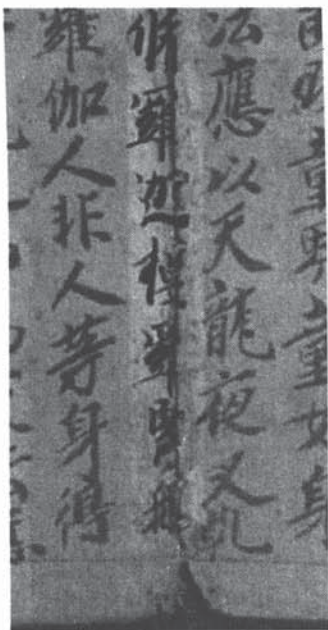


圖8 Or. 8210/S. 5678

顯而易見，此冊原先並非綫裝形式，後來折疊時將中間一行文字折疊。此冊與其他類似的書冊像布一樣穿綫裝訂。

還有很多冊子是採用兩種或更多的裝幀技術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說明當地書籍裝幀發展的歷程。現在尚無發現此種混合裝幀的書籍在內地製作並攜帶到敦煌。Or. 8210/S. 5668 和 Or. 8210/S. 5603 兩個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梵夾裝式的洞口在兩種完全不同形式的書籍上出現：一個是蝴蝶裝，另一個是經折裝。這些書籍顯示內地以及敦煌不同裝幀形制之間的相互影響。目前很確定敦煌的裝幀實踐沒有在中國其他地方發生。宋朝中原地區的一個學者曾說：他的蝴蝶裝書籍散頁了，重新縫在一起，因而洋洋得意。然而沒有現存實物來證明，或者像這樣可以佐證的文獻資料。敦煌書籍裝幀演變也反映了中原地區的演變，在古代書籍裝幀發展史上起著承上啓下的作用。

## 一 蝴蝶裝

蝴蝶裝在中國書籍裝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蝴蝶裝流行於宋代（960—1279）卷軸裝後期、冊葉裝之始（見圖9）。

的確，蝴蝶裝是最先完全從卷軸裝中分離出來的書籍裝幀形制，儘管經折裝和旋風裝有冊葉裝的特點，然而它倆仍然無法擺脫卷軸裝的影響，保留了很多共同的特徵。而蝴蝶裝則力圖打破傳統的裝幀形制的束縛，為中國書籍裝幀的發展開辟一條新的途徑。

英國圖書館敦煌文獻中有幾件蝴蝶裝文獻，有些可以追溯到唐代（618—907）（見圖10、11），據題記此冊乃一83歲的老者於906年所抄寫。

不同於敦煌文獻中的許多寫卷，這些冊葉書籍絕大部分在敦煌當地生產。因為敦煌是中華帝國的一個偏遠小鎮，極有可能這種裝幀形制已經在中原地區流行相當長時間。因此，這些書籍的存在，意味著蝴蝶裝產生的時間比我們傳統認為的要早。現在很難確切地知道這種形制是如何發展起來的，或許是折葉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創新。蝴蝶裝書籍

的特點，紙張折叠之後，構成四面（見圖 12）。折叠之後形成四面裝訂時祇需將折邊對齊，粘在一起（見圖 13）。折叠的邊緣粘在一起，從而形成書脊（見圖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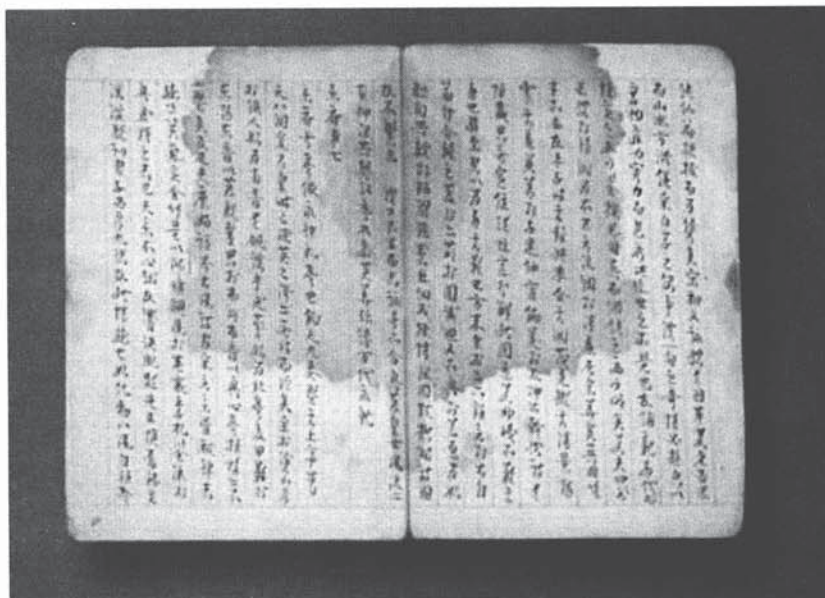


圖 9 文心雕龍 (Or. 8210/S. 5478)

尺寸 (cm): 11.7 × 16.8

與其他敦煌文獻相比，此件紙質平滑而精緻，書品上佳。此外，它是非宗教文獻，不像絕大多數在敦煌製作的冊子是佛教文獻，因此，它很有可能是在中原製作的。



圖 10 折葉的正面 (Or. 8210/S. 5451)

尺寸 (cm): 11.5 × 14.3



圖 11 Or. 8210/S. 5451

從這張照片可以看出折葉是如何粘貼在一起。

折邊形成書脊，每個字母分別代表一個折葉書葉的形狀，以及開合的樣式，非常像蝴蝶的翅膀，因此這種裝幀形制的書籍被形象地稱為蝴蝶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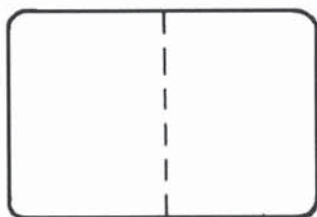


圖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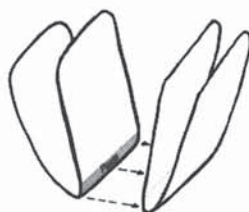


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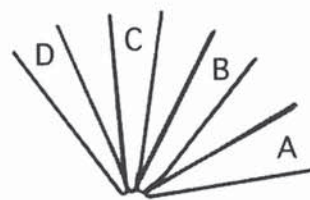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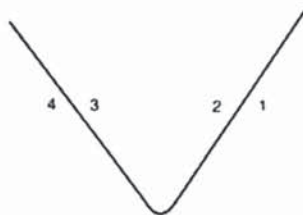


圖 14

這種簡潔明快的設計使之比其他形式的書籍能容納更多的內容。此外，它比笨拙的卷軸，以及沒有裝在一起的經折裝更便於攜帶。這對佛教信徒非常重要，便於他們在途中課誦。同時與其他形式的書籍相比，蝴蝶裝與文獻內容並沒有特別密切的聯繫。經折裝主要是佛教徒使用，旋風裝主要是用於工具書，而蝴蝶裝則沒有限定於某個特殊的使用群體。這就意味着，它是能够完全取代卷軸裝的最早的書籍裝幀形制。

蝴蝶裝出現之後，雕版印刷術已經成熟。英國圖書館所藏《金剛經》（Or. 8210/P. 2）是 868 年印刷的，是雕版印刷技術在 9 世紀已經完善的例證。儘管早期印本是卷軸形式，到了宋代，絕大部分書籍採用蝴蝶裝形式。由於印版的特點，單葉比長長的卷軸更適用。此外，蝴蝶裝的紙張要折成兩頁，意味著兩個連續的頁碼可以在一塊板上印刷（圖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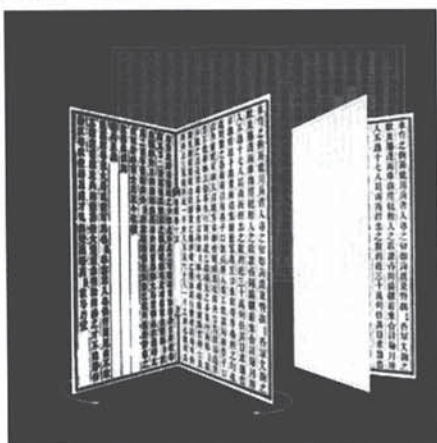


圖 15

該圖顯示每版可折成兩頁，箭頭標示著蝴蝶裝折疊的方向。單面印刷，另一面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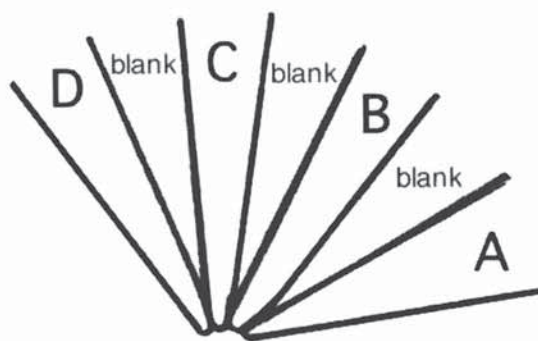


圖 16

每張折葉的背面為空白頁

這是雕板印刷術發展的一個思想，在中國印刷史上一直佔據中心的地位，一直到19世紀從西方再次引入活字印刷。因此，蝴蝶裝與雕版印刷這種特殊關係，使其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並最終發展成其他裝幀形制。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雕版印刷的密切聯繫也是蝴蝶裝的致命弱點。因為雕版印刷的連續兩頁，只能一面有文字，這就意味着此書每隔兩頁會是兩個空白頁（圖16）。這顯然是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因此折頁的方式必須改變。改變折葉方式的結果出現包背裝。這種裝式在明代取代了蝴蝶裝。儘管與雕板印刷技術有密切的聯繫，在敦煌文獻中尚未發現印本蝴蝶裝書籍。這主要是因為在晚唐五代時期敦煌相對封鎖，不但從中原輸入的書籍甚少，而且印刷技術傳到這裏的時間也晚。

由於這種形制曾一度盛行，敦煌文獻中蝴蝶裝書籍要比其他形式的書籍要多。這裏還包括許多“混合裝訂”書籍（見敦煌書籍特徵），即一本書包含幾種不同的裝幀形制，這在晚唐五代時期明顯存在。

## 二 綫 裝

敦煌文獻中綫裝書籍可以幫助我們深入認識中國書籍裝幀的歷史。綫裝書籍在明代後期盛行，是中國書籍裝幀史上後期的代表。中華帝國流傳下來的書籍絕大部分是這種裝幀形制，大家都不陌生（圖17）。

儘管明清（1368—1911）盛行的綫裝書的發明非常晚，然而它的歷史卻可以追溯到很早。敦煌文獻中有些冊葉書籍是穿綫裝訂的，這些書籍最明顯的特徵是它們出現的歷史非常早。某些題記告訴我們，有些綫裝書籍是在唐朝（618—907）製作的，即在明代綫裝書成熟600年前已出現萌芽。更令人吃驚的是多種綫裝技術已經普遍應用。因此，審視一下這些不同技術以便深入了解書籍裝幀發展的脈絡，將是非常有意義的。

用綫穿釘在一起每疊有兩葉以上的紙張在折邊處穿訂在一起。每沓有兩葉或更多的書葉用綫穿訂在一起。每一沓的書脊穿訂在一起。每沓的書脊組成一本書的書脊（圖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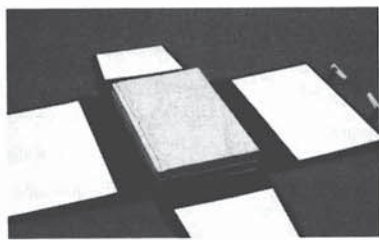


圖 17 綫裝書



圖 18 綫裝書製作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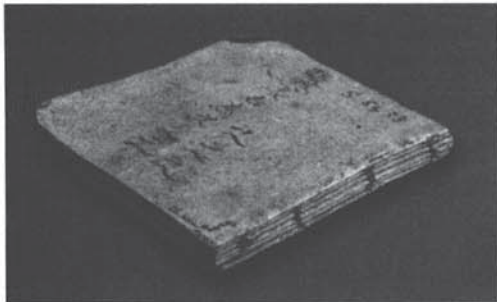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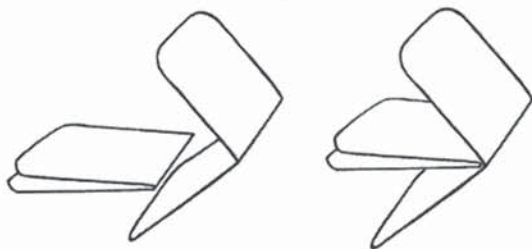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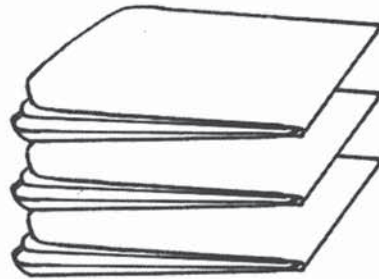
圖 19 書籍的中縫用線裝訂在一起  
Or. 8210/S. 5433  
尺寸 (cm): 8.2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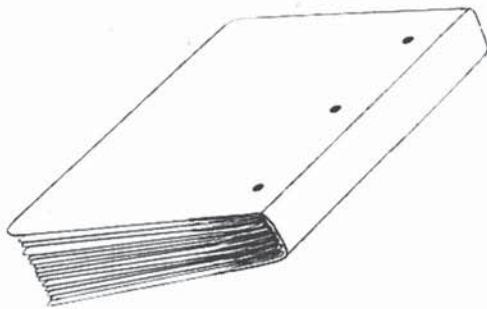
圖 20 用線穿訂在一起  
Or. 8210/S. 54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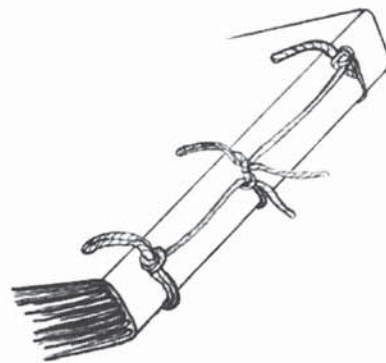
(1) 折疊並戳齊



(2) 未裝訂的數沓碼放整齊



(3) 書的外部包一張書皮，  
然後在書脊處打三個孔。



(4) 用兩根線穿過三個孔，裝訂在一起。

圖 21 Or. 8210/S. 5646 裝訂示意圖

敦煌文獻中絕大多數綫裝書籍都是裝訂在一起，這在中國是一個全新的方法。看來這種技術後來未能延續下來。這是中國書籍裝幀史上的一個獨特現象，值得深入研究。儘管現在無法確切知道這種綫裝書籍在中國是如何發展的，但可以推測其沒有流傳下來的原因。儘管唐代印刷術已經很發達，但是在五代（907—960）和宋朝（960—1279）





圖 22 Or. 8210/S. 5646  
尺寸 (cm): 12 × 10.5

形制，然而蝴蝶裝書籍的一個致命弱點是容易脫葉散亂，因此為加固或修復便使用了綫裝。北宋進士王洙曾寫道：他的蝶裝書籍也存在這個問題，並說用綫穿訂可延長壽命。

唐代出現的綫裝可以用一些實例來說明，這些書籍的綫穿在緊靠中縫的文字處（見圖 8）。

此書顯然原先并非綫裝，因為綫直接穿在中縫文字處，並折疊。這冊書以及其他類似的書冊，像布一樣訂在一起。

這個實例特別證明，綫裝並非原來設計的裝幀，而是後來改進的。

明代綫裝書籍的發展源自對包背裝的改進。包背裝的書葉是用紙捻裝訂，一旦破損很難替代。我們看到，用綫裝延長書籍壽命的實踐可以追溯到唐代。看來這種實踐至少在民間還在繼續，從這一點來講，儘管它消失了，但作為書籍的裝訂技術却仍然保留著，後來演變成中華帝國最流行的裝幀形制。

### 三 包背裝

包背裝在南宋完全取代蝴蝶裝而廣泛應用，與蝴蝶裝最大的區別是折葉方式，它的折葉方式與其完全相反，與雕版有更密切的聯繫，這就導致了此種形制的發展。

蝴蝶裝的最大缺點是，它的折葉方式造成了每隔兩面就有兩個空白面（圖 15）。每版折成兩面，箭頭表明蝴蝶

纔真正流行。由於印版的特性，每版印刷連續兩頁，在包背裝取代蝴蝶裝以前蝴蝶裝一直佔主導地位。包背裝的發展也與印刷技術和印版的特點有關（見下文），然而裝訂的方式與印版有很大的差異。因為這種紙張折疊的方式不可能印刷連續兩頁。因此，可能是與印刷技術的矛盾使這種裝幀形式消失。

敦煌文獻冊葉書籍可能來自蝴蝶裝穿綫改裝，這種發展過程比直接綫裝合訂更容易理解。至遲在宋代末蝴蝶裝是最盛行的裝幀



圖 23 穿在一起

Or. 8210/S. 6983

尺寸 (cm): 10 × 17.7

這本書是敦煌文獻中最簡單的用綫裝訂的書籍。折疊的書葉並沒有粘接在一起，而是非常簡單地在書籍右上角處用綫穿訂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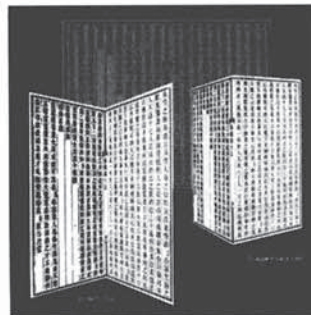


圖 24

裝折疊的方向。每版只能單面印刷，另外一面為空白。因此，當這些書頁粘連在一起，每隔兩面就有兩張空白面。

包背裝用相反的折葉方法徹底解決了這一問題。每版仍然單面印刷，但是折葉時是向外而不是向內折疊（圖 24）。

包背裝和蝴蝶裝折葉方式完全相反。這兩種方式，另一面都是空白面。因為包背裝將空白面折在裏面，因而無法看到。折好的書葉依順序排好，書葉齊向右邊而集成書脊（圖 25）。

這意味著空白面折在裏面，裝訂後即無法看到。代之蝴蝶裝的粘貼，而使用紙捻穿訂。用一張硬厚紙作為封皮，以保護書脊和首葉。包背裝的得名即來自它的獨特的裝訂方式。

敦煌文獻中還沒有發現帶有這些特點的實例。然而，有些書籍封皮另外粘貼一層紙作為保護和加固手段（圖 26）。



圖 25

這本現代綫裝書的折葉方式與包背裝完全相同，右邊開口處集成書脊，折邊是書口。



圖 26 Or. 8210/S. 5432

此蝴蝶裝書籍外面貼了一層紙作為加固手段，書脊中縫粘連的書葉已經散開，但是封皮起到了防止書葉脫落的作用。這本書說明了蝴蝶裝的缺點，並需要改進。

現在還很難確定是否是由此種裝幀形制發展演變成包背裝，不過研究這些書籍以便探究後來的裝幀技術的發展將是十分有意義的。

#### 四 梵夾裝

19 世紀中國引進西方書籍裝訂技術之前，梵夾裝是中國裝幀形制中唯一借鑒外國書籍裝幀的形式。印度的梵夾裝是將修長碩大的貝多樹葉裁成長方形並晾乾，將寫好經文的貝葉依序排好，用兩塊經過刮削加工的竹板或木板將經葉上下夾住，然後連板帶經穿一個（在中間）或兩個洞（居兩端靠裏），穿繩繞捆。這樣既可以把書葉連在一起，又可使文獻免於受損（見圖 27）。

中國對這種裝幀形式的書籍有兩個名稱，一個名稱是梵夾裝，從字面上解釋是“夾着的梵文經典裝訂形式”，特指文獻使用的語言和儲藏方式；另一個名稱是貝葉經，意即“用貝多樹葉書寫的佛經”，特指書寫的材料以及文獻的特質。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名稱的含義結合到一起，可以得到一個精確的描述：用梵文書寫在貝多樹葉上的佛經採用夾板式以繩穿訂的裝式。





用繩穿過木板和貝葉。



夾板和繩起到保護書籍的作用。

圖 27

隨着佛教的傳入，這種外來的裝式進入中國。3 世紀隨着漢帝國的衰落，很多中國人爲逃避動蕩不安的戰爭時代，紛紛信仰佛教，佛教在中國得以立足。結果，很多佛經傳入中國，包括梵夾裝佛經。印度梵夾裝的宗教特性對其在中國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偶爾也用於其他種類的書籍。

紙張發明以前，印度和中國的書籍形式完全不同，其形式主要受書寫材料的制約。扇形棕櫚樹葉的光滑表面爲印度梵夾裝書籍提供了很好的書寫材料，因爲這種葉子薄而平，可以一張張摺在一起。然而，曬乾之後容易碎損，因此上下需要夾板保護。此外，書葉不能彎曲或折疊，因此根本不可能在一邊穿綫裝訂。因此，需要設計一種能不使其彎曲的翻頁方法，結果發明了用繩子將書葉穿起來，確保看書時前後順序不致混亂。然而，在中國很少有這種樹葉，因此無法將其列爲書寫材料。中國盛產木材和竹子，這些成爲中國早期書籍材料，而且早於印度的梵夾裝。然而，這些材料既不薄，也不平，無法像梵夾裝一樣一張張摺起來。代之的是將木材和竹子削成長而薄的簡，一根簡一般只書寫一行文字。將這些簡按順序編排好，就可以一行行讀下來（圖 28）。



圖 28 中國最早的書籍裝幀形式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因爲書籍材料的不同，中國和印度書籍發展的方向完全不同。

三、四世紀梵夾裝佛典首次傳入中國，紙張已經使用了兩三百年。至少在兩三百年之後中國人製作了自己的梵夾裝。原因可能是沒有適宜製作梵夾裝的材料。中國已經不再使用竹、木簡作爲書籍材料，中國生產的精緻紙張也不適宜做梵夾裝。實際上，中國的紙張可以與絲綢相媲美，柔軟而精緻（絲綢曾作爲書籍材料，但是太貴）。儘管早期的紙張已經薄而平，可是它的基本特性與棕櫚葉有很大的差異。如果用中國早期的紙張製成梵夾裝，不但難以翻閱，穿洞時會毀壞紙張和文獻。然而有證據表明類似於梵夾裝



的書籍裝幀技術已經出現在 7 世紀，亦即唐代初期（618—907），雖然並沒有普遍流行，可是在敦煌文獻中却發現很多的實物例證（圖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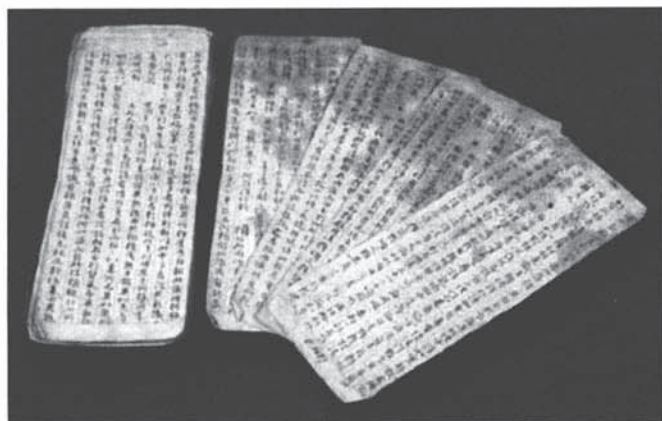


圖 29 敦煌很多梵夾裝書籍僅有一個穿繩孔，而且葉面也比印度梵夾裝要寬

Or. 8210/S. 5537

尺寸 (cm) : 7.5 × 20

儘管英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敦煌文獻中保存的梵夾裝沒有明確的紀年，但可能都在 9 世紀以後。這與這一時期書籍製作材料有關，例如，紙張的質地。敦煌的絕大部分紙張不是在本土生產的，而是從中原輸入到敦煌的。處在兩大沙漠的邊緣，敦煌的氣候非常乾燥，因此沒有足夠植物用於紙張的生產。可是，從 8 世紀以後，唐朝帝國開始衰落，敦煌周圍地區常常處於動蕩之中，與中原的關係受其影響，時斷時續。這就意味著沒有充足的紙張供應，因此不得不在當地生產。與中原紙張相比較，本地紙張厚而粗糙，非常容易識別。本地紙張之厚使其變得硬而有彈性，因此比以前的紙張更適宜製作梵夾裝。可以說，敦煌人開始製作梵夾裝是在 9 世紀以後。

採用印度梵夾裝的佛經基本保持印度原貌：長方形的書葉一張張疊摺在一起，打孔穿繩，兩面書寫，翻頁方式同印度梵夾裝。然而，在為數眾多的英藏敦煌梵夾裝佛經中幾乎沒有留下夾板及繩子。但是我們知道曾用繩子來捆綁過，因為洞孔邊有繩子磨損的痕跡。我們也知道曾用夾板來保護佛經，因為中國國家圖書館仍然存有這樣的例子（譯者注：中國國家圖書館 BD15001 號《思益梵天所問經》是目前所知敦煌文獻中唯一存有夾板及繩子的梵夾裝）。也許因為這一地區木材比較珍貴，處理舊佛經時把夾板和繩子用來裝訂新的佛經（圖 30、31）。



圖 30 Or. 8210/S. 5537

既沒有繩子，也沒有夾板，梵夾裝佛經的散葉只是按順序放好。英藏敦煌文獻中尚未發現夾板和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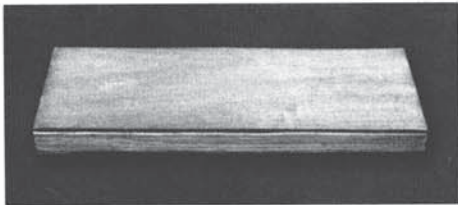


圖 31

這是清朝（1644—1911）經折裝佛經，敦煌梵夾裝佛經可能有類似的夾板。

假如，如同某些學者所認為的，千佛洞 17 號洞窟是用來存放“廢棄的聖物”（例如，不再使用的書籍，因為含有宗教的內容而不能隨意丟棄），這可能是沒有夾板及繩子的原因。

宗教是中國梵夾裝產生的重要原因，它們由佛教徒帶入中國，因為佛教的流行而遍及全國。中國人製作梵夾裝書籍更多的是由於宗教的原因，而不是它比卷軸裝更便利。然而，它卻標誌著中國文獻的內容與裝幀形制的一個重要的轉變。此前中國絕大多數書籍採用卷軸裝，文獻內容與裝幀形制沒有特別的聯繫。中國梵夾裝產生以後，意味著文獻內容與裝幀形制發生分離，這必然影響其他裝幀形制的發展。梵夾裝給予中國最大影響莫過於其紙張組合及裝訂方式。

通觀中國早期書籍裝幀的歷史，書籍是卷起來存放的。印度梵夾裝的貝多葉是一張張摺在一起，引入了“葉”的概念。因此，中國的漢字“葉”，可能來自印度梵夾裝貝多葉的葉。

## 五 旋風裝

旋風裝可能是冊葉裝代替卷軸裝過程中最獨特的裝幀形制，其獨特的結構比其他形制給予我們更多的啓迪，這種裝幀形制的文獻內容暗示了它產生並發展的原因。旋風裝是根據自身特點而形成的一種裝幀形制，在歷史上可以說是曇花一現。但是它是書史發展的一個環節，一旦出現更適用的形制，旋風裝便退出歷史舞臺。

宋朝（960—1279）許多裝幀形制得以發展，旋風裝很有可能在此時不再使用，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今天有其他很多裝幀形制的遺留，而旋風裝卻僅發現一二件。因為缺乏實物材料，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學者們僅是借助於歷史文獻材料來推測旋風裝的形制。然而因為文獻記載非常籠統，這樣便造成種種誤解，直到最近現存實物被發現，纔逐漸明朗。歷史上長期對旋風裝的探求，使其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富魅力的書籍裝幀形制。

中國有關旋風裝的文獻記載非常少，然而所有的綫索都集中在唐代王仁煦所編輯的韻書《刊謬補缺切韻》。唐朝書法家吳彩鸞抄寫很多，看來當時非常盛行，以至於這種文獻後來常常被稱為吳彩鸞書《唐韻》。從宋朝早期的記載一直到清朝（1644—1911），提及旋風裝均與這個文獻有關。1980 年，李致忠先生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發現一件《刊謬補缺切韻》抄本，此件寫卷的發現首次將文獻記載與實物相印證。儘管這個寫本曾在古代被改裝過，但從中仍可以發現其原始的裝幀方式。嚴格地說，它仍然不能被視為完全可靠的旋風裝樣本。然而，這個重要發現推動了對旋風裝的研究與探索。

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英國國家圖書館的敦煌文獻中發現幾種被認為是旋風裝的寫卷



(圖 32、33)。

旋風裝的書葉打開後朝一個方向卷收，很像空氣分若干層朝一個方向旋轉旋風，這也許是旋風裝得名的緣由。



圖 32 Or. 8210/S. 6349

旋風裝卷起來後與卷軸裝很難區別。

這些抄本絕大部分沒有被重裝過，由此可以清楚地認識這些寫本是怎樣裝訂的以及為什麼採用這種方式。

現在尚不知道旋風裝書籍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根據現有材料很可能是在晚唐（盛唐）時期。故宮博物院抄本《刊謬補缺切韻》的題記說明它是在公元 749 年抄寫並裝訂的。這一時期，唐朝達到頂峰，國家穩定富強，文化繁榮。特別是詩歌幾乎佔據了整個文壇，使唐代成了詩歌的黃金時代。因此，韻書的盛行便不足為奇了。不單是韻書，其他的參考書也有廣泛的社會需求。顯而易見，卷軸裝卷和收非常不便於翻檢，這便需要突破傳統的卷軸裝形式，另辟蹊徑。我們必須記住，今天所發現的旋風裝全是參考書，這絕非巧合。

一個在社會上廣泛流行並已經成型的裝幀形制並不是容易突破的。一直到唐代，中國的書籍裝幀以及裝幀技術並沒有變化，即使是製作書籍的材料大不相同。在紙張流行之前，文獻是抄在竹木簡上，用繩編簡成冊。竹木簡被平行地穿在一起，因此，當打開時，豎寫的文字可以一行接著一行地讀下來（圖 28）。收藏時，即將其卷起來。這是中國最早的裝幀形制，這種裝幀形制及儲藏方式在中國持續了一千多年。

紙質卷軸裝祇是簡單模仿竹木簡，將數張紙按順序粘連在一起，這樣文獻好像寫在一張連續的紙上，儲藏方式也是卷起來。然而旋風裝的裝訂方式却是全新的，代之一張張像鏈子一樣粘起來的是，所有的單葉按順序摺起來並粘連在一起，如同現代書籍一樣，每一頁都可以翻動，這樣可以很容易翻檢所需內容。

現在很難確切地知道是什麼原因促使從過去流行的裝幀形制中推陳出新，也很難接受沒有其他影響對此發生作用。然而，從公元 4 世紀左右中國已經有另外一種裝幀形制——梵夾裝。儘管在唐代以前尚未發現在梵夾裝書籍上書寫文獻或者發展自己的梵夾裝。這些書籍的存在表明在旋風裝出現之前將紙張摺起來的概念在中國已經有幾個世紀的歷史。很難想象梵夾裝沒有對旋風裝粘葉方式發生影響。



儘管梵夾裝對旋風裝的發展有多少影響尚有爭論，然而兩者的文獻內容却是大相逕庭。梵夾裝全是佛經，旋風裝則是參考工具書。因此，看來中國從卷軸裝分離的第一步，文獻的內容對各自裝幀形式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中國書籍裝幀發展史的重要一步，標誌著中國對書的認識有了根本的轉變，書籍的特殊功用以及內容都是需要考慮的。

即使旋風裝是對卷軸裝的一種改進，它的最大長處也是其弱點，它是卷軸裝向冊葉裝發展過程中的過渡形態。這並不是說後來的所有裝幀形制都來源於旋風裝。其形態及功用可以簡單地歸納為：書葉如同現代書籍，卷收如同卷軸。卷軸裝歷史如此悠久，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改變。

下面是英藏敦煌文獻中唯一一件旋風裝書籍的描述。



圖 33 Or. 8210/S. 6349

卷起來的旋風裝的軸心相當於冊葉裝的書脊

圖書館編號：Or. 8210/S. 6349

題名：易三備

尺寸：共有 5 頁，高約為 30cm；長：第一紙為 22.5cm，第二紙為 30cm，第三紙 30cm，第四紙 50cm，第五紙 68cm。

裝訂方法：按順序將所有紙摺在一起，這樣最短的紙在最上面，最長的紙在下面（圖 34（1））。一張比一張長。左邊戳齊，並粘連在一起。將一截與紙高相等的竹竿劈成兩半，將書葉左邊上下夾在一起，打孔穿繩（圖 3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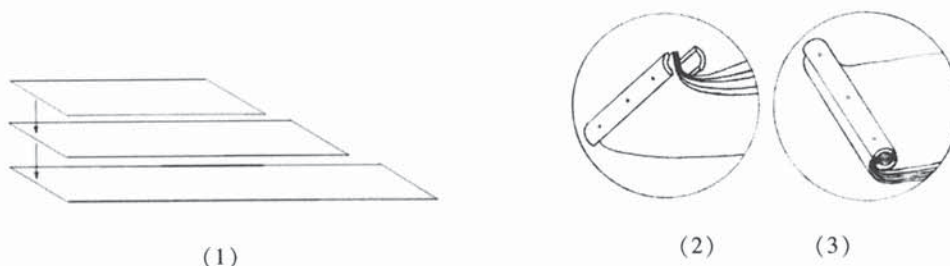


圖 34 旋風裝製作示意圖

收藏文獻時，像卷軸裝一樣卷起來，因此最下面的一頁——最長的一頁在最外面，因此從外表看與卷軸裝沒有區別（圖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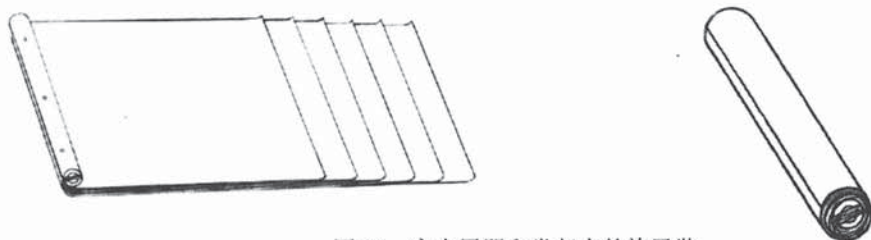


圖 35 完全展開和卷起來的旋風裝

這個寫卷以及目前發現的其他相同的例證，說明旋風裝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標準的書籍裝幀形制。

## 六 經折裝

經折裝的一個非常有趣的特徵是印度和中國傳統裝幀方式的融合。同時它也是第一個外部採用小冊子形式的書籍，成為中國書籍裝幀史中另外一個重要形式。儘管如此，人們對其發展歷史却少有關注。如同梵夾裝一樣，經折裝文獻的主要內容也是佛經，這也是其得名經折裝的原因。晚唐以降，經折裝在中國佛教徒中廣泛流行。這也暗示了它的歷史更早，或許可以追溯到中國佛教徒開始使用梵夾裝時。然而中國的梵夾裝卻從來沒有流行，這主要是由於它的式樣以及製作材料。儘管兩者都是清一色的佛教徒使用，而經折裝卻命運截然相反，非常流行。因此，假如我們認為這兩種相類似的裝幀形制的書籍為生存而競爭，也許可以認為由此導致從卷軸裝向冊葉書籍的轉變。

與其他裝幀形制的書籍一樣，現存最早的經折裝也是在敦煌文獻中發現的，這些實物材料表現出強烈模仿梵夾裝的意向。經折裝的書葉長而窄，經文豎寫，一行可寫很多字，每面只能抄寫數行（圖 36），經折裝書籍亦有似梵夾裝所打之孔，因為書葉是粘在一起，無法像梵夾裝一樣閱讀，這些孔實際上並沒有產生作用。然而，這也說明梵夾裝對經折裝所產生的影響，特別表現在內容和形式方面。



圖 36

經折裝與梵夾裝有許多相似之處

然而不同於梵夾裝的是，經折裝可能是從卷軸裝發展而來，這種改造便是將卷軸展開，從頭至尾以一定的行數或一定的寬度連續左右折疊，形成一個個折葉，讀者可以一



頁頁地翻動。所以不但形式非常像印度的梵夾裝，而且一樣的容易翻閱。此外，文獻無需穿繩，對紙張無損害，延長了書籍壽命。利用這個方法，現存的卷軸裝書籍很容易改裝成經折裝。儘管無法確定過去曾在多大的範圍內改裝過，但是在英藏敦煌文獻中即有原為卷軸裝後改為經折裝的例子。

通過對兩種裝式的簡單比較，很容易發現為什麼經折裝會替代梵夾裝，並影響到其他形制的發展。印度梵夾裝引入中國以後的最大創新便是書籍的單葉摺放，這既便於課誦，也便於攜帶。這兩個方面曾對中國冊葉裝書籍的發展起過很大的作用。敦煌很多富於實踐的佛教徒，表現的尤為突出。敦煌石室發現的冊葉裝佛經絕大部分是私人抄本（圖 37），並製成便於隨身攜帶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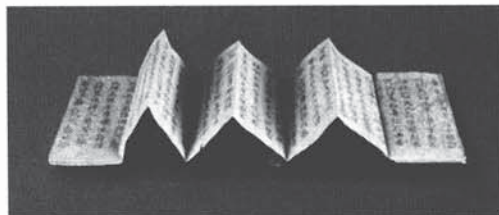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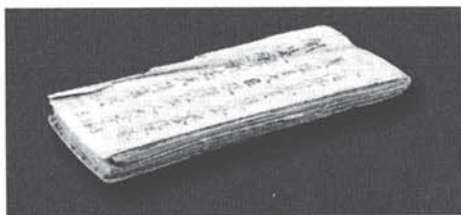


圖 37 Or. 8210/S. 5618

尺寸 (cm): 6 × 13.5

這種製作精巧的經折裝書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非常便於隨身攜帶。這個經折裝書籍製作粗糙，說明敦煌地區作書的目的是為了便利而不是美觀。



圖 38 Or. 8210/P. 11

尺寸 (cm): 每折 10 × 14

這件實物是經折裝與蝴蝶裝的混合體，也是唯一一件印本書籍，書籍的折邊粘在一起，如同蝴蝶裝的折頁。經折裝這一簡單的改進使其更容易攜帶和翻檢。

經折裝書籍無疑對其他裝式的發展起過促進的作用，不過很難說這種發展的過程產生了多大的影響。英藏敦煌文獻有一些冊葉裝書籍是集經折裝與其他裝幀形式於一體（圖 38）。儘管它不能作為書籍史的一種裝幀形制，但是以此來研究書籍發展的每一具體過程將是非常有意義的。

#### 參考文獻：

- CHANG Bide:《唐代圖書形制的演變》，《圖書館學報》，1964 年第 6 期，1—8 頁。  
陳國慶：《古籍版本淺說》，香港：爾雅出版社，1977 年。  
杜偉生：《敦煌文獻中的旋風裝》，敦煌與中亞文獻保存保護研討會，柏林，1998 年。  
李際寧：《敦煌遺書的梵夾裝》，《敦煌吐魯番學研究論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 年。  
李文綺：《中國書籍裝訂之變遷》，《圖書館學季刊》1929 年第 3 卷第 4 號，後收入《圖書印刷發展史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5 年，477—488 頁。  
Li Yaonan:《中國書裝考》，《圖書館學季刊》1930 年第 4 卷第 2 號，207—216 頁。



- 李致忠：《古書“旋風裝”考辨》，《文物》1981年第2期，75—78頁。
- 李致忠：《中國古代書籍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 李致忠、吳芳思（WOOD, Frances）：《古書梵夾裝、旋風裝、蝴蝶裝、包背裝、綫裝的起源與流變》，《圖書館學通訊》1987年第2期，74—85頁。
- 劉冰：《中國裝訂簡史》，臺北：漢華文化，1969年。
- 劉國鈞：《中國古代書籍史話》，香港：中華書局，1972年。
- 劉國鈞、鄭如斯：《中國書史簡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1年。
- 馬衡：《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圖書館學季刊》1926年第1卷第2號，199—213頁，後收入《中國圖書資料集》，香港：龍門書店，1974年，195—208頁。
- （清）錢曾：《讀書敏求記》，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
- 丘陵：《書籍裝幀藝術簡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 蘇瑩輝：《從早期文字流傳的工具談到中國圖書的形式》，《圖書館學報》1965年第7期，22—33頁。
- 王以坤：《書畫裝潢沿革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
- 蕭燕翼：《吳彩鸞書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80—82，85頁。
- 余嘉錫：《書冊制度補考》，《余嘉錫論學雜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539—559頁。
-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叢書集成本。
- Drege, Jean - Pierre, "Les cahiers des manuscrits de Touen - houang." in M. Soymié,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 - houang*, Genève, Droz, 1979, pp. 17 - 28.
- , "Les accordéons de Dunhuang." in M. SOYMIÉ,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 - houang*,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Paris, 1984, pp. 195 - 204.
- , "Notes codicologiques sur l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et de Turfan." *Bulletin de V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 74, 1985, pp. 485 - 504.
- , "The Dunhuang and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 and the history of books." *Chinese Studies*, Londres, The British Library, 1988 (Occasional Papers, 10), pp. 171 - 174.
- , "Du rouleau manuscrit au livre imprimé." in Roger Laufer *Le Texte et son inscription*,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Paris, 1989, pp. 43 - 48.
- , "La lecture et l'écriture en Chine et la xylographie." *études chinoises*, 10, 1 - 2, 1991, pp. 77 - 111.
- Fujieda Akira, "The Tunhuang manuscripts : a general description." Part 1, *Zinbun*, 9, 1966, pp. 1 - 32.
- Martiniq, Edward, *Chinese Traditional Bookbinding: a Study of its Evolution and Techniques*,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San Francisco, 1983.
- Maspero, Henri, *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ème expé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e centrale*,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3.
- Stein, Sir Aurel, *Sennidia*,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1.
- Tsien Tsuen - hsuin (錢存訓), *Paper and printing*,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5, Part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英文見：<http://idp.bl.uk/education/bookbinding>

（作者單位：英國國家圖書館

譯者單位：中國國家圖書館）